

思维的秘密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文举◎著

思维的秘密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研

蔡文举◎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维的秘密：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研究 / 蔡文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5161 - 9052 - 4

I. ①思… II. ①蔡…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 研究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759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芮 信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164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大学共建马克思主义项目成果

目 录

| | |
|-------------------------------|------|
| 导论 历史之谜与现实之谜 | (1) |
| 一 问题的缘起 | (1) |
| 二 研究价值和意义 | (3) |
| 三 研究现状 | (3) |
| 四 一些概念的说明 | (9) |
| | |
| 第一章 前康德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索 | (11) |
| 第一节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崭新阶段 | (11) |
| 一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历史溯源 | (11) |
| 二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社会基础 | (14) |
| 三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思想前提 | (20) |
| 第二节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论形态 | (23) |
| 一 经验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索 | (23) |
| 二 唯理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索 | (29) |
| 三 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一般本质 | (36) |
| 第三节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内在逻辑 | (42) |
| 一 认识过程中的内在逻辑 | (43) |
| 二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 (49) |
| | |
| 第二章 德国古典哲学对前康德哲学的超越 | (54) |
| 第一节 思维与存在逻辑统一的理论前提 | (54) |
| 一 “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 (54) |
| 二 “哥白尼式的革命” | (60) |
| 第二节 思维与存在逻辑统一的理论内容 | (68) |
| 一 先验逻辑的前提 | (69) |
| 二 先验逻辑的核心 | (74) |

| | |
|------------------------------|-------|
| 三 先验逻辑的局限 | (82) |
| 四 先验逻辑的意义 | (90) |
| 第三节 思维与存在逻辑统一的理论意义 | (92) |
| 一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 | (92) |
| 二 德国古典哲学的地位和意义 | (97) |
| 第三章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变革 | (99) |
|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的历史背景 | (99) |
| 一 黑格尔哲学的局限 | (99) |
| 二 费尔巴哈哲学的困境 | (103) |
|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的具体内容 | (108) |
| 一 活动统一性——实践概念辨析 | (108) |
| 二 否定性统一——实践思维方式解析 | (121) |
| 第三节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的伟大意义 | (139) |
| 一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的理论意义 | (139) |
| 二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的现实意义 | (141) |
| 参考文献 | (144) |
| 后记 | (152) |

导 论

历史之谜与现实之谜

一 问题的缘起

本书以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为研究主题，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因素。

首先，从理论上看。近代以来，认识论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哲学思维方式的秘密所在。认识论是哲学及主体认识能力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哲学和主体认识能力的“标本”。认识论把哲学和主体认识能力呈现为对象性存在物（哲学理论），主体寻求终极性必然表现为（哲学）认识论，认识论也必然伴随主体和哲学成为永恒的问题。思维的过程必然是建构的过程，阐述的过程必然是某种意义的“宏大叙事”。严格意义的哲学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认识论的发展同西方文化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即一直以来文化上的一种割裂现象。这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直接相关。哲学上的表现则是上帝总是或隐或显地成为理论上的“一极”，更多的时候是根本性的“一极”。这就造成了哲学认识上的割裂，无论是客体式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还是主体式的认识论思维方式，都是对这种割裂的弥合，即对割裂在理论上的解释性弥合。根本上是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的新时代起点上，这一问题才清晰地呈现于近代哲学的理论视野中。特别是洛克明确提出反省主体认识能力，才真正吹响了主体意识在近代觉醒的号角。在这样的前提下，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凸显，主体性原则在近代的建构才成为可能。这是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沿主体内化方向（唯心主义或二元论方式）发展。在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基础上，德国哲学给出了主体思维的逻辑体系，使认识在逻辑上成为可能，使主体意识与对象意识同一，在意识内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是，德国哲学的理论呈现形式要么是二元的，要么是独断的，这是近代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一个环节；当理论着眼点在存在

(唯物主义的方式)方面，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不但要兼顾第一个环节，还要解释清楚主体认识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止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恰恰是在没有理解第一个环节的情况下才表现出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是旧唯物主义无法克服唯心主义的原因所在。马克思哲学对整个近代哲学的超越就在于为思维与存在统一提供了现实性基础，使思维能动性前提下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体系有了真正的现实内容。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变革不但颠覆了理性哲学的传统，还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见，没有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量变，就不会有马克思哲学的质变。以上的分析也是本书研究的理论依据：以止于马克思哲学的西方哲学史为背景，以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解决为理论关注点，研究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

其次，我们看两个生活中的例子。我母亲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她在农村的仓库内始终都存有“余粮”，多年以来均是如此。“余粮”对于她而言，是直接解决“挨饿”（包括可能的情况）的有效办法；节约、不浪费食物对于她来说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本能的问题，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行为。这在我看来，可能是那一代人的共性特征。当我把这件事情和我的导师高文新教授（他也有类似生活经历）谈起时，他给出的解释是：他“挨饿”的程度比农村人还要严重，但是他没有存“余粮”，因为他对粮食收入、经济形势等因素有明确的判断，食物不是影响他生活行为的考量因素。是什么原因使相似经历的人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不考虑行为本身的意义）？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包括他作为哲学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在马克思去世后的130余年的历史中，关于马克思的“主义”至少有三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种“主义”内部关于马克思（理论、思想）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以我们熟悉的国内研究情况而言，关于马克思哲学同样存在着三种争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①）。马克思是个生卒年限明确的历史人物，关于他思想的理论文本也是明确的，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明确的形象裂变为多重的形象（不考虑具体内容的争论）？

^① 相关论文参见王玉樑《实践哲学与实践核心论》，《新华文摘》2012年第3期；刘福森《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三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陆剑杰《实践唯物主义：彰显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真切之名》，《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我认为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至少有一个相同之处：在不同的主体面对相同的认识对象时，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差异性结果的形成——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认识，也包括理论认识。我认为在主体、客体方面都能列出冗长的影响因素清单，但是影响因素清单的罗列只是证明了问题的存在，不等于问题的解决。那么，这是不是“认识论中的原教旨主义”^① 追问反而显得更重要，这直接关涉问题本身是否有价值。我在本书写作期间，就以上问题请教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中心的韩志伟教授，他将这个问题定义为“社会认识论”，暂时用这个概念来代表我的思考。

二 研究价值和意义

通过对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变革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其与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关系。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哲学中尤为明显，即后现代哲学的某一种思潮往往成为当今中国哲学阐释马克思哲学的一个视角，而马克思哲学反而成了这种思潮的标签，这种标签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人为外在联姻，不是对马克思哲学以标签主义的方式进行过度解读，就是对马克思哲学以标签主义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歪曲，标签的马克思主义与标签的主义本身表现出兴衰的同步性、踟蹰的同步性。这种方式于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价值不大，我们应该循马克思开创的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推进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一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本书不敢奢谈有多大的理论价值，主要目的是还原马克思实现的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过程，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是十分必要的。在我看来，马克思实现的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与社会认识论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对于破解社会认识的差异性问题具有基础作用。

三 研究现状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实质是对前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实践是认识现实性及内容性的逻辑前提，辩证法则是认识过程中的思维原则。马克思没有建构认识论的逻辑体系，虽然列宁称《资本论》为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马克思的逻辑学，但是列宁意义上的逻辑学也仅是马克思认识论的逻辑体系的表现形式，而非认识的逻辑依据本身，这是马克思哲学实践思维方式转向后留给哲学的遗产，也是哲学理论的真正生长点。在认识论的维度而言，国内外哲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认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第一，国外研究现状。

社会认识论所“指代”的两种现象（不只是这两种现象，而是有很多类似现象）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我的很多阅读伴随同样的思考。我认为以下几种理论触及了社会认识论的问题，这同时是当今西方哲学推进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的表现。

发生认识论^①提出了“格局”^②的概念，这是使人的认识得以可能的身体机能、机制，是人逐渐具备的一种能力，根源于人的活动。在人的活动中，人会把各种对象在“已有格局”中“运演”，运演的结果是人的格局在逐渐丰富和完善，最终趋于稳定、固化，人就会形成相应认识对象的思维结构。随着人的活动逐渐增加，这样的结构会越来越丰富，并形成互相联系的、动态的概念化之网，此后关于对象——主要是客体的认识（格局中的“联结”）就是在此种思维结构的框架下做出的。认识就是对是否联结做出判断，人逐渐会把一定的认识对象在固定的关系结构中做恒常性的联结，并把因果性赋予这种联结，因果性的思维结构是基于体验格局建构的。基于以上认识，皮亚杰得出一个结论，关于对象（客体），存在着不被人体验到的格局（对于新事物的认识就是此种情况），这种格局就可能形成不了关于对象的认识——基于已有思维结构，或者形成关于对象的错误认识。进一步讲，人形成了关于认识对象的思维结构，关于对象的认识也是思维结构内的（同类事物的认识）已有“联结”的输出，人对对象的认识是在思维结构内的“运演”，人形成的思维结构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象具备），认识结果所依据的思维结构又会存在于认识结果之外，认识结果作为思维结构外化的表现，而思维结构却在外化结束时隐没了，我认为隐没的思维结构和思维结构由以建立的“格局”可能

^①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王宪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此部分的所有直接引文均引自此书，在本书主体部分论述的过程中涉及具体内容标注页码，下同。

^② 参见[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王宪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中译者序第4页定义及第21—62页相关论述，下同。

是造成人的认识差异的一方面原因。

普通认识论^①则表达了与发生认识论几乎相同的理论旨趣，区别在于皮亚杰着眼于前抽象思维阶段，而石里克则研究抽象思维阶段的认识情况。石里克认为认识过程有两个关系项：“所是”与“认为所是”，认识无非是将所是置于认为所是的位置，即一个对象在另一个对象中被“再发现”。主体通过概念系统把处于“认为所是”位置的对象置于已有关系系统中，以期实现关系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寻求。这种差异性结果是主体对概念间的关系的判断，即新认识形成的过程就是主体判断的过程。主体通过语言、文字等手段以“记号”的形式实现对新判断的“标示”，这样的“标示”就是形成内涵和外延清晰的新概念，从而实现概念和对象“一义性”“配列”，即实现概念和对象的一一对应关系。概念是关系的纽结，对关系的判断构成了思维之网的“经纬线”。石里克进一步指出，不能把意识“嵌入”空间（对象、实在），而只能把空间“定位于意识中”（对象在意识内被认识），在主体的思维之网中不断完成新概念的生成，从而实现认识过程。笔者认为：石里克主张的“认为所是”的概念系统是造成认识差异的关键因素，石里克主张人的认识的效用性在不断地校正着认识的形成。我们将石里克在这方面的考量与皮亚杰对“格局”的主张做横向的比较，发现他们都强调了经验在认识的形成中的作用。

就我现有的阅读范围而言，杜威的《我们如何思维》^②、蒙塔古的《认识的途径》^③等都在“纯粹”的认识论问题域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一一展开论述。我认为还有部分哲学家以“间接”的形式触及了社会认识论问题。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④一书中追问马克思的实践观得以可能的依据，即阿尔都塞对“一般乙”的追问。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由“一般甲”出发得出“一般丙”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由“一般甲”到“一般丙”的思维过程却使“一般乙”含而不露，“一般乙”的缺失被阿尔都塞称为“断裂”。笔者认为，阿尔都塞是在认识论维度追问马克思获得正确

① [德] 石里克：《普通认识论》，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 [美] 约翰·杜威：《我们如何思维》，伍中友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美] 威廉·佩铂雷尔·蒙塔古：《认识的途径》，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④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认识的合理性依据、逻辑依据。进一步讲，实践是逻辑前提，历史唯物主义是逻辑结果，辩证法是由前提到结果得以可能的依据（阿尔都塞认为简单地说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置”是没有说服力的）。阿尔都塞是在追问“依据”的依据，为辩证法寻找“辩”的逻辑支点，解决辩证法是如何展开的、如何“辩”的问题，阿尔都塞提供了这样的支点^①——“多元决定下的不平衡系统”——吸收毛泽东的矛盾思想对“断裂”环节做解释。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在此我将有关阿尔都塞“断裂”说的争论搁置^②，针对阿尔都塞提出的问题谈几点认识：首先要弄清楚阿尔都塞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我认为阿尔都塞追问认识过程所遵循的逻辑依据，不是对“断裂”前的主张，也不是对“断裂”后的申诉。其次，假如马克思哲学存在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断裂”，那么这样的“断裂”在认识的开端就已经存在了，即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就会存在，而不会是在马克思由前实践思维方式到实践思维方式过渡中才有“断裂”。由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哲学存在与“经验主义公式”“决裂”的现象，即马克思是从“一般甲”——抽象认识出发，而不是从感性认识出发而实现理论上的质变。假如有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一般丙”对“一般甲”的“不适应”，那么一定存在“一般甲”对这种抽象认识前提更大的“不适应”。这样的“不适应”是否否认马克思认识起源于感性的依据，恰恰是在阿尔都塞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部分，在一般与具体的论述中，马克思强调了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如果按阿尔都塞的方式理解马克思——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否认了“一般甲”的感性起源，则会把马克思哲学降为前康德哲学，甚至唯名论的水平。但是，我认为阿尔都塞强调的“一般丙”对“一般甲”的“不适应”确有其合理性，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断裂”存在于一切人的认识过程中。最后，如果阿尔都塞为了找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依据，强调认识的“质变”过程存在“断裂”的现象，这也是认识论在当今发展的困惑所在。从认识的连续性角度而言，不是“断裂”，是断而不裂，用“断层”“年轮”来概括这种现象似乎更贴切。这样可体现出认识过程既有积淀

① [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232页。阿隆认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可能进行了一种“伪结构主义解读”。

② 参见李文阁《阿尔都塞的“根本问题”及启示》，《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

性，又有新生性；既有内容性，又有区别性。我认为就阿尔都塞提出问题的实质而言，有休谟问题的影子，也是一直以来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二元论思维方式的“症结”所在，虽然马克思在哲学史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理论仍然处于模糊之中。^①

我认为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②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触及了社会认识论中的差异性问题。在此处的论述，“意识形态”没有政治学含义，泛指意识内对人的认识形成影响的因素。曼海姆认为，人在动态的社会系统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同一个世界可能是不同的”。笔者将曼海姆给定的原因加以归纳：“横向”（现实社会环境、阶层变迁等）因素和“纵向”（历史、统治阶级塑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使人的世界观作为解释原则失效或部分失效，解释原则的唯一性被多样性取代，神圣性被世俗性取代。那么，同一个认识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解释原则下必然获得不同的认识结果。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等都出现了“无意识的集体动机”，就是由于“纵向”因素作用而形成的“静态社会”下的意识形态。社会地位和知识层次的不同也是一方面原因，“社会地位上和思想上同质的参与者之间与社会地位和思想上异质的参与者之间”面对相同的对象会形成不同的认识。曼海姆强调了语言不是造成认识差异的原因，语言不过强化了体验、经验认识及思维结构等固有差异的结果。我认为曼海姆一方面强调了客观的、物质性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强调了主观因素、意识内的影响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种意识内的影响因素作为客观因素来看待，并认为二者是“思维结构中质的成分”，从而分析了二者对人的认识形成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的意识内的这样一种存在，它总是试图引导人去“关注”一些事情，而有选择地“忽视”一些事情，并维持人的认识方式，努力使人的认识方式常态化、固化。而“乌托邦”则与“意识形态”相反，它恰恰善于引导人去关注被“意识形态”“掩盖”的事情，总之，双方都对对方“掩盖”的事情感兴趣，“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试图同化人的认识。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2页相关论述。

^②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托邦》一书中表达了要在动态的社会系统中寻求人的认识的统一性，即要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种客观因素纳入经验事实的关系中考察，强调经验现实仍然是影响认识的前提，并将之视为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在社会认识中对“现代思想家的挑战”^①，我认为这是曼海姆真正的深邃之处。

第二，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在认识论维度得出消极结论，这样的认识论困惑使认识论在国内哲学研究中也不是“显学”，所以关于此的著作及学术论文与流行的“思潮”“主义”相比寥寥无几，关于国内对认识论的研究情况也只能在专家、学者的著作及论文的“微视角”下来论述。对相关文献部分索引结果列举：高清海先生1983年发表的《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贺来教授2005年发表的《“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2011年发表的《深化“主体性”研究的重大课题》——从“认知主体”到“价值主体”；孙利天教授200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王天成教授2000年发表的著作《直觉与逻辑》；欧阳康教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高文新教授2013年发表的《实事求是探析》等。若不局限于认识论角度，以“实践”为关键词在知网等数据库进行检索，相关文献多不胜数，在此不一一列举。

西方哲学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严格意义的哲学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晚近的事物。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处于哲学话语的边缘、远端，从而也决定了中国哲学阶段性的性质——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传递性、解释性，但是中国哲学也具有后起优势。西方哲学由古代到现代的繁荣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探索，而中国哲学从西方哲学的传入到现在不过百余年的历史，现代西方哲学的繁荣得益于前康德哲学的一大批原创思想家扭转了哲学的发展方向，实现了认识论转向。当今中国哲学的“繁荣”得益于以高清海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的创新和探索，基于此才能有中国哲学在认识维度、理解维度上的认识论转向，使中国哲学整体水平至少达到或者接近马克思哲学的水平。尤其是高清海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新

^①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页，路易斯·沃思为该书所作序言。

维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高清海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很多后学晚生细致而微的主张。

贺来教授在《“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一文中强调要在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基础上理解认识论，不能仅仅在主体建构这一个方面理解认识论，任何一种建构形式都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认识论根本问题的一种理论呈现；贺来教授在《深化“主体性”的重大课题》——从“认知主体”到“价值主体”一文中强调认知主体的价值功用和意义维度，从而主体的认识过程不但是思维过程，还是意义、功用的过程。孙利天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意义》一文中强调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问题；高文新教授在《实事求是探析》一文中强调认识的现实性维度和功用性维度，其他观点不一一赘述。

四 一些概念的说明

结合以上分析，我认为在人的大脑中存在认识由之而来的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将人的认识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在正文部分论述中，我将感觉—知觉系统构成的前概念阶段称为体验格局，将概念式的认识阶段称为“逻辑格局”。格局用以泛指形成认识的依据，与思维结构、认识结构、认识模型具有同等含义。我将体验格局到逻辑格局的认识过程称为“剥离”，将逻辑格局对体验格局的统摄称为“嵌入”。结合以上分析，我在正文的论述中试图寻找各个阶段哲学家形成理论认识的阶段性思维模型。我认为前康德哲学在意识—表象思维模型下进行理论探索，康德在知性—表象、理性—物自体双重思维结构中建构了先验哲学，黑格尔在动点轨迹的思维模型下思考问题，马克思则建构了动态开放的认识模型。

我母亲存“余粮”的行为是对“存‘余粮’”的认识结果的反映，可能是基于对体验格局的恐惧，因为“挨饿”不仅存在于感觉—知觉的范围内，还产生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和下意识层面的暗示作用。我认为包括存“余粮”和节约都是关于粮食的意识形态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固化后产生的行为结果，不排除经验的怀疑主义成分和非理性的心灵成分；而我的导师则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即乌托邦精神打破了粮食—“挨饿”的恒常性联结，因而他没有困于认识的剥离过程。我认为第二个现象与第一个现象可以做类似的分析，专家、学者基于理论传承、生活经历等体验格局的固化认识，坚持对马克思哲学剥离—嵌入的排他性主张，在对马克

思哲学剥离一嵌入的过程中虽然产生了乌托邦精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格局，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名分”之争就是这种情况。

近代西方文明在宗教改革之后，世俗化趋势不可阻挡，哲学从旧形而上学领域逐渐转向对现实的关注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哲学上的此种转向由康德开启，到马克思时期（包括尼采、孔德等），哲学转向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康德哲学在正文的论述中占据重要篇幅，对现实的分析在正文中也占据一定的篇幅。

我在正文的论述中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将截止于康德的哲学（认识论）发展定义为“认识为真”的阶段，将截止于马克思的哲学发展定义为“认识为实”的阶段，将后马克思哲学定义为“认识为异”的阶段。我认为康德建构的先验逻辑已经解决了意识层面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将认识为真的标准指向了先验性（统觉、范畴）；马克思哲学已经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现实统一，实践贯通了社会和历史；后马克思哲学正在着手解决社会认识的差异性问题，寻求“真实”认识的统一途径。在这样的视阈下，我认为马克思实现的实践思维方式哲学变革与后现代哲学在理论上具有同样的先进性，甚至“实践”视角已经成为后现代哲学发展的前提，“旧形而上学”式的哲学研究势必是历史的倒退。因为“认识为实”是“认识为真”和“认识为异”的“环节”。所以我认为“重新退回”^①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历史并在变革的历史中对变革加以审视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寻找“认识为异”阶段的统一性必将产生一定的启发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现实统一，破解了“历史之谜”^②，但是思维与存在关系又成为现实之谜困扰着人们，认识论仍是未竟之事，所以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5—75页相关论述。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重新退回”到“真实历史”，才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

^②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第一章

前康德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索

在 17 世纪中叶（一般指英国工业革命后），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阶段。较之于中世纪和古代，科学和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是近代的显著特征。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与自然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前康德哲学需要对时代主题进行理论反思。

第一节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崭新阶段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近代化的过程也不例外。近代化的产生经历了短暂的孕育时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是近代化的三个动力源，同时也为前康德哲学进行理论反思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加之中世纪哲学和古代哲学的理论传承，在近代的开端逐渐形成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哲学思潮。

一 前康德哲学探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历史溯源

1. 古代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索

古代哲学经历了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及希腊化三个发展阶段。哲学作为一种新的解释原则晚于并脱胎于神话和原始宗教，哲学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摆脱宗教及迷信的过程，表现为去道德性、去神秘性而代之以客观性、自然性的过程。人类思维在这一蜕变的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同一时期内形成了几个文化“轴心”^①：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而哲学则是文化的轴心，这几个哲学体系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5 世纪。

希腊文化表现出不同于宗教文化（印度文化）和伦理文化（中国文

^①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